

### 第三届东亚符号学国际研讨会综述

东亚符号学会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2年10月4—6日在武汉大学举行。本届会议由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和日本大学主办，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波兰、日本、韩国、蒙古及两岸三地的近80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会议，收到中英文论文60余篇。学者们围绕“符号学与东亚文化的全球意义”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 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研究意义问题是符号学的核心问题，也是20世纪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清晰性和深刻性的对立，被认为是哲学文本所面临的两难。国际符号学会名誉会长、华沙大学教授佩尔茨认为这种两难是不存在的；我们既要追求清晰性，也要有深刻性。清晰的文本是思想清晰的表现，它能更好地传达思想、深化思想。思维清晰的人更能精确地区分对象，看到对象之间更多更细致的联系，更能洞察事物的本质。不清晰的思维尽管表面上看似深刻，其实只是一种幻象，而清晰的思维则通过清晰的语言能揭穿这种幻象。

著名语言哲学家、德克萨斯大学教授马丁尼奇在评价解构理论、形式主义理论、作者意向论和读者反应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意向性理论，认为考察意义的来源必须从三个方面入手：语词、言说者和听众。但他认为还有第四个方面，即“意义不在任何地方”。第一，语词只有处于系统和关系中才有意义，但系统和关系总是难以捉摸的，因此意义不在任何地方。第二，如果意义在某个地方，那么它必定是明确的、不变的，这样它只能存在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既然空间范畴仅仅适用于物理对象，那么作为理想实体的意义就不在任何地方。

波士顿西蒙斯大学的朴异汶教授利用认知科学的新成果，从隐喻化的语言入手考察了实在、思维和语言间的关系。他认为，与常识、心理-语言学及传统的哲学相反，从认识论来看，语言先于思维、思维先于实在；在此基础上，有必要在哲学中对所有语言中的一些核心概念如实在、真理、知识和哲学概念本身进行修改；语言的本质特征是诗化的。

2 中国文化的符号学研究用符号学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特色。湖北大学李先焜教授用现代符号学的观点和结构主义的方法诠释了中国传统医学中的阴阳、五行、经络、针灸。他认为，可以把这些概念看做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符号系统，如阴、阳表示人体中具有相反性质的部分，金木水火土五行可以看做五种不同性质的符号，从结构主义的观点把人体的各部分看成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系统。首都师范大学的周建设教授考察了先秦语言来源问题。他认为，语言意义和语言符号的来源问题是探索人类认知奥秘的重要聚焦点，先秦关于语言意义来源的看法主要有两种：“象”“意”摹写论和感官认知论；关于语言符号来源的理论主要是约定俗成论，当然命名过程本身也有一定的规则。南开大学的张斌峰博士就周易研究提出了看法。他认为，周易研究到现在为止主要是语形研究和语义研究，而把它的“语用”实践忽略了。因此，除了要继续完善周易符号学的语形学与语义学之外，应当着重转向周易语用学的建构，使周易的符号学研究始终能够配合中华文化的创新之“大用”，从而凸显其人文情境中的人文之用的语用学特征。

女书是在湖南省江永县和道县流传的一种女性文字，它是妇女创造、妇女使用、描写妇女生活的特殊文字。中国女书作为世界唯一的女性文字一进入世界视野，迅即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介绍了女性文字的特征、女书作品的内容和抢救女书的规划。中南民族大学的谢治民教授认为，从女书字符实际的语言功能状况看，女书绝大多数字符与其所标示的音义无直接联系，这类女字应属记号性字符；女书文字应属一种举世罕见的记号音节文字，绝不是表音的音节文字。

中国文化的符号学探讨是本次讨论会上最突出的内容，关于中国文化的符号学研究已经成为学术界发展的重要新生力量。

3 东亚文化的符号学研究来自韩、日、蒙古等地的学者积极作了关于本国文化符号学研究的发言，探讨了东亚符号学发展的前景。云南师范大学的韦世林教授在对文面空符号和语流空符号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建筑-空符号的符号特征，并深入分析了东亚地区建筑-空符号的特殊形态及其文化内涵。东亚的“平房文化”与“围墙文化”就是以特殊的建筑-空符号形式突出地表现了东亚传统建筑的文化特色。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维萨克教授从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入手对符号学的发展做了一种批判性的分析。他指出，西方符号学在通过全球化传入东方的同时也带进了它的概念模式和理论预设，因此人们往往用西方来规定东方。这会阻碍东方符号学的发展，因为以佛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不同于西方的传统，而东方文化也有丰富的符号学资源。西方的符号学渊源可以追溯到东方的波斯和印度，我们可以建立一种超越东西方二分的更广泛的符号学视点。

（李涤非、潘磊）